

琼州盐事说古今



# 海南盐事

文\本刊特约撰稿 陈光良

## 四面环海的千年大盐场

盐在我国古代被视为“食肴之将”和“生民喉命”，不但人人仰给，生活必需，更是国家或地区的财政之源和商贩竞争敛财之货。因此，从盐卤的采集加工及其制盐技术的进步，食盐的产销营运消费及其价格的涨落，盐官、盐商、盐民的制约与盐政、盐法、盐课的演变，等等，都可以探测一定历史时期国家或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轨迹。

古人早就体会到“无盐则肿”，人若长期淡食则全身浮肿，四肢乏力。海南岛上的原始居民，在海浪进溅的礁石坑凹处可捡到晒成薄片状的白色结晶体，他们尝试用来烹调食物感觉味道咸美，活力倍增。后来，他们只要将自然蒸发到一定浓度的卤水舀到石坑处暴晒，或用釜器烧煎，就可以收获需要的盐巴，正如许慎《说文解字》所言：盐，“卤也，天生曰卤，人生曰盐”。

海水是制盐取之不尽的开放的资源。海南岛四面环海，环岛沿岸热能充足，日照时间长，近岸表层海水浓度(波美度)一般在2~3B°e，西南部(莺歌海一带)高达3.5° B°e，即100升海水中含有3.5升盐，且海水纯净度高，是著名的威海区和晒盐的好地方。

唐代，岭南道盐产地是：广州新会、潮州海阳、儋州义伦、琼州琼山、振州宁远等5州5县，海南岛占其三。《新唐书·地理志》明确记载“乾元元年(758年)，琼山、宁远、振州等县有盐，近海百姓煮海水为盐，远近给。”

唐胄在《正德琼台志》中指出：“盐筴专于管，氏(世)代沿至今，读唐地理志，知琼列盐”。所谓“盐筴”，通俗解释是指食盐人口的册籍。邱濬说：“自管仲兴盐筴，以夺民利，始开盐禁。”由此推测，自唐代起，琼崖官府也可能编制食盐人口的册籍，以榷盐利。但如唐胄所言：“琼宁远、义伦等县，各注有盐，而无则例。”

宋代的广南置东西两路，广东路分产盐区4州和非产盐区10州，广西路分产盐区9州(包括海南的琼、崖、儋、万安4州)和非产盐区16州。从开宝四年(971年)宋军平岭南起，广南开始榷盐。一方面统购民盐，不给盐本，而“与免役或折税”，另一方面，实行官运官卖的政策，但从史料可见海南时常有官商客贩之间变通的作为。

明代，海南盐业经济进入全面发展的时期。明朝廷依据各盐产区之地位，设有都转运盐使司和盐课提举司，其下设分司及盐课司，通过这三级机构，实施对盐业生产、运销的管制。海南明初改划归广东行政，但盐业实行国家专卖经营体制，故海南盐业仍隶属海北盐课提举司，治所在廉州府城内。海北盐课提举司共管辖15盐场，盐场设有盐课司，海南置有6场6司，即：大小英感恩场(琼山)、三村马袅场(临高)、博顿兰馨场(儋州)、临川场(崖州)、新安场(万州)、陈村乐会场(文昌)。盐课司有正、副大使一员，攒典一员，管理灶户产盐和征收盐课。明代，海南盐业在生产规

模、内销外运、经营管理以及盐政实施等方面，比之前代都有诸多改进和发展。

清代，我国盐业大致沿袭明朝“官督商销”的专营管理体制。所谓“官督商销”，就是政府控制食盐专卖权，并设立相关的盐政衙门，对商人的纳课、领引、配盐、运销进行管理稽查。清代海南盐业在盐场建设、办盐纳课、招商引资和技术进步等等，都有新举措。

如盐场建设方面，整合与新增并重：琼山县合并大英、小英、感恩三厂称为西厂，将南渡江东岸新建的塔市厂称为东厂；各地在维持老盐场正常运作的基础上还新建许多盐厂，如：永和厂(临高县)、马岭、小南厂(儋县)、岭脚厂(万宁县)、调懒厂(会同县)、昌化厂等等。至乾隆后期，沿海建成沙田4324坵，池漏增至4325个。19世纪下半叶，海南盐业突破官营一统体制，出现股份制的投资经营方式。如咸丰四年(1854年)，有股东投资兴建“承德漏”，但详情无考。同治八年(1869年)，电白县红花尾人李隆春与崖县陈氏族人合股投资，在三亚港兴建“润和漏”。光绪三十四年(1908年)，福建华侨胡子春筹建股份公司，在三亚港湾建筑大盐田，直接引导海潮晒盐。由于三亚建设盐田条件优越，晒盐技术比较成熟，产量提高很快，尤其品质优良，食用俱佳，遐迩闻名。

民国二年(1913年)，两广盐运使以本岛盐务缺乏专员管理，有碍盐政，设三亚场于崖县三亚港，置盐场知事一员，场佐一员，于各县分置验缉员九员，统理运销、缉私、税收、秤放各事宜，后来因故迁驻海口。1922年11月，孙中山派宋子文担任两广盐务经理，开始收回广东盐课征收权。

20世纪初期，本岛以晒水盐田产量最多，占总产量90%以上，主要分布在崖县、陵水、昌化、感恩等县。琼山、文昌、儋县、临高、万宁、琼东等县为漏灶区，仍沿用传统方法制盐。1928年，全岛计有石田(结晶池)1936亩，水田(蒸发池)11200亩，盐田(沙漏)2160亩，盐漏810亩，漏户(用晒沙淋卤晒生盐户)972家，灶户(晒水煎煮熟盐或漏水煎煮熟盐户)46家，共3390人。年产生盐598465担(近3万吨)，熟盐25631担(约1280吨)。

1933年，德国人史图博对三亚盐田有这样的记述：“在三亚港的内湾有很大的盐田，为一股份公司所掌握，获利甚丰，投资五万元，在五年之后就收回了资本。总的来看，由于政府放宽盐政，海南各地盐品生产日趋扩大，吸引各路商贩前来运销，流通畅顺又促进航运

交通发达，盐业经济愈益发展成为近代海南经济的增长点。

1939年，日寇南侵，海南岛沦陷。据《海南岛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辑要》记载：“在盐业方面，有三井物产会社在北黎与南丰寺之间，设有制盐场六十处，年产盐三万吨”。日本人早就觊觎莺歌海的盐业资源，1941年，三井董事长滕枝得率日海军特务部台湾专卖局技师山田贡实地考察，并编制了年产34~41万吨的盐场开发计划。1942年初，由海军特务部北黎支部地政系伙同“东亚盐业株式会社”，在该地区进行勘测和施工，后因战败而告终。

1945年8月，抗日战争胜利，琼崖盐场公署从定安迁回海口，下设榆亚、昌感两分署及塔市、文昌、琼东、陵水、万宁、保平、海头、感恩、临高、儋县等10个场务所。1946年，“中国盐业公司”成立莺歌海盐场筹建机构。1947年宋子文回海南时，曾策划向海外集资建场，但因时局动荡而停止。

据1948年出版的陈植编著

## 2 『天下人惟盐丁最苦』

唐代以前，海南岛人口稀疏，经济落后，沿海居民从事食盐生产多是个体或家庭以满足自身消费为主，或有多余也跟散居山岭的黎人通过盐物交换，聊补所需。唐朝官府设岭南道，置义伦、琼山、宁远三地盐场，之后，本岛盐业为官府控制。据考证，唐代“山海并灶，收榷其盐”，与此同时，官府还对盐民实行强制性的管理，规定所有从事制盐的人，必须向政府登记以取得盐籍。入籍后的盐民，生产生活都被置于“场监吏”的监管与督催之下，不但产量有定额、纳课有条约、盐品转运有规制，即连人身权利也遭受剥夺。两宋的食盐生产体制错综复杂，除了比较稳定的官府雇佣制，还有盐民自煎制、租佃煎盐制、民间雇佣煎盐制、劳役制及“混合所有制”等等。

明洪武初期，在全国推行“配户当差”的“括户制度”。“濒海有盐灶”，则定为

记载：“洪武间(1368~1398年)，本岛六场共管灶户正丁五千零二十四丁，……共科盐六千二百五十三引十二斤八两，岁运廉州新村盐仓上纳。”(注：盐引，每引四百斤或七百斤不等)。

灶户是专门从事盐业生产，为朝廷提供盐课收入的差役户。“灶丁按册办盐”是明廷统制盐业生产的重要制度。“正丁盐课”又称正盐，即政府所派定额之内的盐。由于丁盐征收的标准是“日办三斤，夜办四两”，所以又称为“日课”。这里所指“日办三斤，夜办四两”，若以年计，则是灶丁的岁办盐额。如万历《广东通志》卷7记载，灶丁“每岁办盐则为五引零一百八十五斤”，岁以365天计，共办盐1185斤。但在海南盐课史料中，常有提到各场灶丁“办盐不等”。

盐场灶丁常年累月遭受“酷暑日晒沙淋卤之苦”不说，在惨罹兵寇海贼杀掠之



海南千年古盐田，镌刻着老盐工几多沧桑与辛劳的记忆。

海南日报记者 李幸璜 摄

《海南岛新志》统计：“本岛盐田生产量，约为5万吨(约80万担)，除2万吨(约32万担)供本岛消费外，余悉经广东及香港向大陆输出。……据琼崖盐场公署三十六年(1947年)底报告，海南产盐现行场价，每担国币8万元，食盐税率，每市担为363275元。渔盐为107275元。”国民党政权垮台之际，通货膨胀，物价飙升，盐价(出厂价)每市斤800元，渔民买盐(批发价)每市斤达1072元，币值如此之低贬，可谓空前绝后。

灶籍。在灶籍的人户，即是灶户。朝廷为保障有足够的人力提供盐课收入，对灶籍人户管制极为严格。编入灶籍的人户，必须世代“以籍为定”，“世守其业”。明代灶户来自三方面：一是前朝遗留灶户；二是徙罪人煎盐赎罪；三是编金盐场附近有田产、丁力的民户为灶籍，如广东、海北，明初“民户、蛋户见灶户免差，皆求投入盐司。”据《正德琼台志》和《琼州府志》

后，仍要承担官府盐课和名目繁多的差役加派。据《琼州府志》记载：“天顺间(1457~1464年)，感恩场禾丰杜村三厂，灶丁为海寇杀掠，余正丁二百三十丁，共盐二百三十引三十斤。嘉靖末(1566年)，又惨罹兵寇，死者众。额丁亏损。各场官复，每丁加派花灯及火工、灶甲、棚长等役，灶丁苦累，懋贤按琼乃令各场刻石示禁。”

下转 B03版▶